

V-2401

5

花溪區文史資料選輯

第一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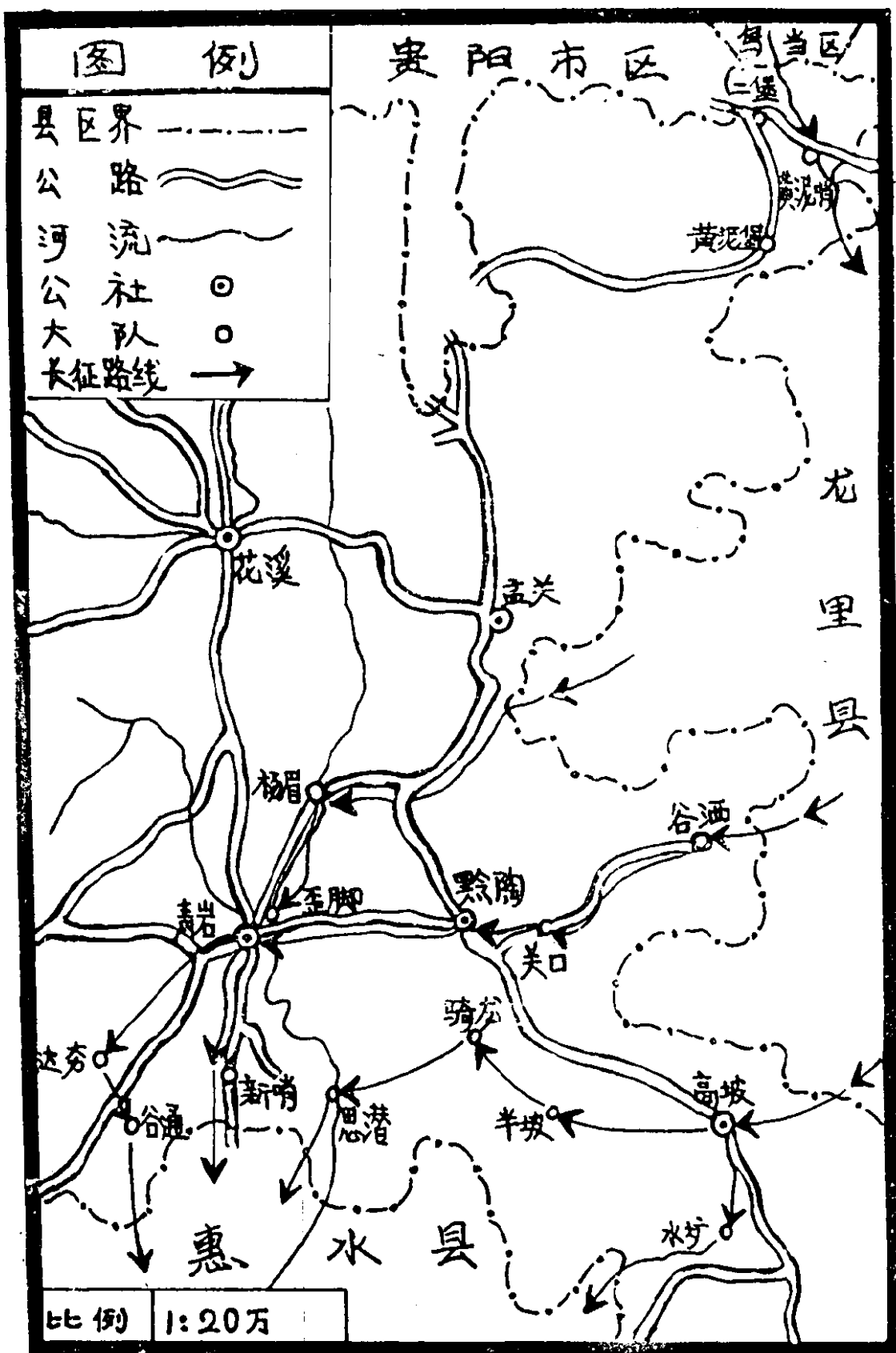
82

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一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二年八月



红军长征过花溪区境内示意图

前 言

文史资料工作，党和国家十分重视。它是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是政协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社会主义四化建设中，这项工作更有着特殊的意义。

花溪区政协从一九八一年七月成立以来，即开始注意征集整理有关我区文史资料的工作，并成立了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下设征集组、编辑组，决定不定期出版《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选辑作者亲身经历见闻的从清朝末年到十年内乱期间有关我区的重要史料。通过这一工作，如果能够真实地反映我区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为我区的四化建设服务，能够对青少年有教育意义，那就是我们的希望了。

由于领导的重视，我区各界人士的支持，《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第一辑今天终于跟广大读者见面了。

这一期共选了三篇，从这三篇中，我们可看到花溪地区在多少年代以前，已经留下了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足迹，在许多村寨传播了革命的种子，这是花溪人民的骄傲。我们还可看到清华中学—花溪中学的前身，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革命事业作出了贡献。

由于这一工作我们还仅仅是开始，加上水平有限，无论是史实的核对，还是编排上的问题，不当之处在所难免，切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为了今后把这一工作搞得更好，我们热切欢迎广大读者多提建议和意见，并望了解情况的同志，能于忙中提笔撰稿，寄给我们。如对本选辑发表的稿件有不同看法，亦望本着求实的精神，展开讨论。

我们深信，在区政协的直接领导下，在我地区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花溪区文史资料的征集整理工作将会取得更大的成绩，《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也将会办得更好。

编 者

目 录

前言.....	(1)
红军长征过花溪区.....	张永吉搜集整理 (1)
解放前夕清华中学革命活动见闻.....	周克勤 (6)
“筑光音乐会”女中队在花溪的活动.....	陈胤孙 (11)
征稿启事.....	(17)

红军长征过花溪区

张 永 吉

毛泽东同志说：“长征是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以后，中国工农红军为了继续北上抗日，避开敌人在川黔滇三省边界设的封锁线，突然由川南折回贵州，四渡赤水河，通过枫香坝，南渡乌江，直逼贵阳。红一方面军于一九三五年四月八日（旧历三月初六日）分兵三路进入花溪境内。

第一路从乌当区进入花溪区小碧公社黄泥哨，到黄泥哨后插进龙里县境内，三月初七从龙里县水场公社进入花溪区孟关公社黑石头（现莲江化工厂），经杨眉、摆托、歪脚到达青岩镇。

第二路于三月初七日从龙里县朵花冲进入花溪境内，经谷洒、翁丫、关口、黔陶、长冲、高寨河，和第一路红军在青岩镇会合。这两路红军在青岩镇会合的第三天，又分成两路向惠水方向进军。第一路经达夯、后寨、节麻、双井入惠水。第二路出青岩南门，经新哨、小山入惠水境内。

第三路红军于三月初七日从龙里县朵花冲进入花溪区高坡公社，随后分兵两路向惠水方向前进。第一路从高坡出

发，经拐苏、翁西、水塘、格棒入惠水甲腊冲，另一路经小寨、石板寨、半坡、骑龙、赵司、思潜、小山进入惠水境内。

红军在花溪境内四天，行程二百三十多华里，在三十多个大小村镇，留下了他们的英雄足迹。至今，仍流传着许多可歌可泣的动人故事。

黄泥哨枪响 蒋介石魂飞

红军南渡乌江，直趋贵阳，蒋介石为了保住贵阳，亲自来到贵阳督战。他急令当时的贵阳市公安局长兼警备司令王天锡在贵阳城周围修筑碉堡工事。正在这时，他的一名部下神色仓皇的跑来报告：“敌人已到乌当，清镇飞机场附近也发现敌人的便衣队。”这一报告可吓坏了蒋介石，他一下子从沙发椅上跳起来，迫不急待地向王天锡下令：“去准备一下，挑选二十名可靠的向导，预备十二匹好马，两乘小轿到行营听用，越快越好。”同时，他又命令滇军孙渡所部加强防守龙洞堡到贵阳的主要交通要道。蒋介石还未来得急逃跑，红军就以惊人的速度到了黄泥哨，与孙渡的先头部队相遇，激战一个多小时，打死打伤敌军数十名，胜利地进入龙里境内。蒋介石听到城南外的枪炮声，魂不守舍，坐卧不安，直听到红军撤走的消息才稍微定心。

狮子山设下天罗地网 吴其伟远道“送枪送粮”

四月十日（旧历三月初八）下午四点多钟，青岩镇东北角二里路的狮子山下响起了急促密集的枪炮声，一直持续到深夜零点多钟，这是敌人得知红军已到青岩镇，急命令吴其伟部队尾追。红军已在青岩休整一天，再加上狮子山地形有

利，决定摆开战场，给追来的敌人以迎头痛击。红军当时的临时作战指挥部就设在高寨河原刘西文家房里。在八个多小时的激战中，红军战士英勇顽强，坚守阵地，打垮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最后，吴其伟部队在一片鬼哭狼嚎声中，夹着尾巴，狼狈不堪的逃回贵阳。这次战斗，打死打伤敌人一百多名，缴获各种枪支弹药数百件，补充了红军的军械，大家嘲笑吴其伟这个草包远道赶来“送礼”。这次战斗，灭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长了红军的威风，当地的穷苦百姓无不暗暗拍手叫好。

打富济贫 宣传革命道理
买卖公平 保持红军传统

红军大部队到青岩的前几天，有一个江湖杂耍班子来到青岩镇。当时的青岩镇是一个千多户人家的大镇，他们当场坝上铺开摊子，演狗春碓和猴戏等吸引着镇上的大人和小孩，暗中都摸清了全镇的武装和经济情况，记下了为首几家恶霸地主的姓名和住址。红军大部队一到青岩，红军宣传队根据杂耍班子（红军的便衣队）提供的情报，在街头大张旗鼓的宣传抗日道理。一位十五、六岁的红军小战士不畏惧敌人枪弹的袭击，爬到很高的城墙上，用草把写下了“打倒贵州的大军阀王家烈”！“白军弟兄联合红军弟兄北上抗日”，“苏维埃政权万岁”等标语，同时搜查了几户恶霸地主的家，没收了镇上有名的刘、黄、贾、吴等几家恶贯满盈的大地主的家产。红军对穷苦百姓却亲如一家，将没收地主的部份财物分给穷苦百姓。狮子山战斗打响以后，有位姓张的帮工，家住歪脚，他听到枪声，担心自己家里的安全，不顾

一切的往家跑，哪知道误进了火力区，还是一位红军战士猛扑倒在他身上，用身体掩护了他，才免遭敌人的子弹。现在，他经常提谈红军的救命之恩。红军对普通商家小贩也秋毫不犯。红军刚到青岩时，青岩镇几乎是座空镇，因为老百姓听了反动宣传，不了解红军的真象，除极少数老弱病残在家外，其余的早已外逃躲避。红军部队宁可露宿院坝屋檐，没有得到房主人的允许，他们不踏进家里一步。青岩镇上有个小商，名叫陶永兴，他开了一个杂食店，红军听说他家卖烟，就去叫他家的门，他吓得全身发抖，颤巍巍地开了门，结果红军买了烟，按他的卖价如数付了钱，他感动得紧紧握住红军的手久久不放，当天他第一个放心大胆地打开铺面欢迎红军。红军战士的言语行动使广大群众认识到只有红军才真正是穷人的队伍，红军并非反动宣传的烧杀掳掠的洪水猛兽。很多人陆陆续续地返家，商店也照往常一样开业，人们敢和红军战士接近，有很多人还专心聆听红军宣传的革命真理。就这样，短短的两天多时间，红军和青岩镇的人民群众建立了鱼水之情。

红军为百姓 百姓爱红军

红军撤走后，青岩镇和歪脚村里的十多个青年人自动组织起来，在战场上寻找到几具英勇牺牲的红军尸体，他们趁着黑夜，洒着眼泪报着对红军的爱，对白匪的恨，将白匪的尸体拉来垫底，将红军战士埋在上面。另一位红军埋在歪脚后面的关众山顶上。在行军途中，有两位红军战士病故，一位被当地群众埋在高坡王坡山下，一九六二年由杨忠品、周亚玲、筑志刚、陈远明等迁埋在现在高坡公社所在地对面的小石山

上：另一位被当地的罗华山、罗寿山、罗明礼等四人掩藏在隐蔽的尖坡脚岩洞里，一九七二年八月一日由黔陶公社关口大队民兵连装棺转埋在谷洒至翁丫之间的公路右侧山坡上，如今当地的人民群众每逢清明节，都要去扫墓，缅怀为革命光荣牺牲的先烈，并向下一代讲述当年红军长征的英雄故事。

人民群众还保护和保存了红军当年画的壁画和书写的标语。在高坡街上文少华家楼上的两幅红军壁画和一条红军标语保护得比较完好，标语的内容是：“红军是穷人的战士。”高坡老街上陈富玉家的两堵墙壁上分别留下了一幅红军壁画和红军标语同样保护完好。标语的内容是：“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壁画的题字是：“白军弟兄团结起来，枪口朝外，（此处几个字不明显）红军联合，一同到北方去打日本帝国主义去”。如今，这些珍贵的壁画和标语已经成为花溪地区最为宝贵的革命历史文物，它是我国革命历史的写照，是艰苦创业的见证，它说明了一条真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红军长征，已经是四十多年前的革命历史了，但红军的英雄业绩，却永远被人们传颂，并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解放前夕清华中学革命活动见闻

花溪中学 周克勤

一 前 言

1949年，白色恐怖笼罩着贵阳山城。国民党反动派已感到末日将临，正疯狂挣扎，而革命烈火却越烧越旺。当时我在清华中学工作，学校师生中有理想、求进步的人不少。在地下党的领导下，他们同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现在我将当时的所见所闻作一个简略叙述。由于我一直是个党外群众，不十分了解当时的革命活动全貌，也不深知一些事件的来龙去脉，加之事隔三十多年，许多细节业已遗忘，所以难于有错误。现仅将点滴回忆写出，如有出入，请当事人及有关同志给予指正。

二 黎明前的战斗

1949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军事上已溃不成军，走向覆灭已成定局，而在政治上，它也早已失尽人心，使得天怒人怨。他们妄图用白色恐怖来作垂死挣扎。他们在光天化日之下，公然以“开展反饥饿、反内战活动”为罪名，公开杀害老贵大（校址在今贵州农学院地址，习惯上称之为老贵大，以区别于解放后建立的贵州大学）进步学生史健，又在

花溪街上闹市里抓走进步学生甘继勋（现名甘凌杰）。但是，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每一次逮捕或屠杀只能是激发群众掀起又一次的革命风暴。老贵大的反饥饿、反内战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清华中学的革命活动亦随之风起云涌。当时清华中学教师姚国安（后来才知道他是地下党员，现已病逝，曾任上海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和梁燕，在青年教师和高班学生中传播进步思想，组织和介绍师生阅读进步书籍。当时清华中学图书室藏有不少进步书籍，如马克思的《资本论》，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斯诺的《西行漫记》等等。姚、梁等人除介绍学生阅读这些书籍外，还直接介绍学生学习了一些地下党的刊物和宣传马列主义的著作。姚、梁等人的这种长期细致的工作，使很多青年教师和学生从同情革命到支持革命，以至直接参加革命。在组织教师和学生阅读进步书刊的同时，姚、梁等还发展了一批青年教师和学生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据说叫“民青”（即“中国民主青年同盟”的简称）。当时，清华中学的许多革命活动就是靠这些同志发动和开展的。他们通过组织文艺晚会、游园等方式进行革命宣传。如1949年5月下旬的一次晚会，曾由高二班（姚国安老师任班主任）集体朗诵高尔基的《海燕》和师生自编的诗歌，由初二班（廖崇美老师任班主任）演出了闻一多同志编写的《茶馆小调》。这些节目由于政治立场鲜明，诗歌内容战斗性强，所以深深地激起了师生的共鸣。节目的吸引人达到如此程度：在四百多人的中学生晚会上，竟然寂静得鸦雀无声。节目一直演到深夜。大家都以敬佩而激动的心情，含着泪花，对每个节目报以热烈的掌声。另外就是发动和组织教职工开展“改善公教人员

生活待遇”的斗争。在地下党的发动和支持下，以廖崇美同志为代表（其后不久廖被国民党反动派在“双十一”大屠杀中杀害）的清华中学教职工多次派出职工代表（现花中肖醒球副校长也是当时职工代表之一），向学校董事会交涉，要求增加工资，并酝酿罢教。这次罢教学潮，虽由于董事会的让步，或者也许是由于当时策略上的需要，最终没有形成，但经过召开多次大会小会，起到了动员组织群众的作用。此后，在清华中学教师中自然形成了以廖崇美为首的一批年青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对校内的顽固势力作了不少卓有成效的斗争。例如，国民党军训教官徐某，平时师生对他经常给予白眼。有一次，他被学生挖苦所激怒，在办公室发牢骚，说要辞职不干。廖得知后，马上发起为他开“欢送”会，很多人立即凑钱聚餐“欢送”。徐下不了台，只好尴尬地承认并不真想辞职。廖说：“我们都已订好筵席了！”徐只好说：“那么我也出一份钱，改作聚餐吧！”军训教官徐某威风扫地，而清华中学的革命气氛更浓了。

三 革命者的机智转移和特务的狼狈可笑

大约在6月初，花溪的白色恐怖日益严重。在地下党组织的指示下，在进步师生的协助下，姚、梁等革命同志已经了解到特务的魔爪快要伸到清华中学来了，他们决定转移。据事后了解，转移前一天，他们处理了文件，交代了工作，还写了辞职信，向校长交了课务，然后才从容离去。第二天一早，我们看见布告栏里公布了姚国安、梁燕、廖崇美、段以睿等老师请长假的公告。果然，在他们走后的第二天或第三天，特务们就来到了清华中学。他们向校长要人，向师生

打听姚、梁等人的去向。这当然是妄想。当时，姚的宿舍就在“丙所”楼上，我住楼下。那时宿舍附近的住户很少，夜里很安静。我不止一次在半夜醒来时还听见“魔鬼”们上楼梯的脚步声。对着那明明白白已是人去楼空的宿舍，特务们还妄想碰碰狗运气哩！我不禁暗自好笑。此后一连十几天，清中发生了一连串怪事：今天有姚国安的同学来找姚，明天有姚国安的亲戚来找姚。最可笑的是，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子，自称是姚国安的“妹妹”，来打听“哥哥”的下落。当时有许多学生在操场上上体育课，她向学生问这问那。学生们早已洞察她的来意，故意围上去看她怎么表演。这位“妹妹”显出十分急切的神情，说什么家里有要紧事要找姚，向大家问，姚到哪里去了，有没有留下什么话……等等。当然，同学们不可能也决不会给她任何她所需要的答复，不过是逗着玩，使她显出原形罢了。果然，同学们的战术颠昏了来人，后来，她突然问漏了嘴，竟问出“姚国安是不是湖南人”这句话。人群里突然“轰”的一声爆出了大笑，这位“妹妹”才发现自己话里有漏洞，胀红了脸，灰溜溜地夹起尾巴匆忙逃走了。由这事，足以显出特务们是多么情急、无耻和低能。

此外，老贵大学生朱文达的转移，也颇富于传奇性。朱文达是清华中学的校友。在老贵大学运初期，他本不拟出头露面。后来到了关键时刻，他不得不亲自出面领导学运。在特务们横行时，朱一直秘密往来于贵阳——花溪之间。但特务们始终没有找着他。据说，有一次，朱刚上汽车，就被特务发现。那时汽车快要开了，特务们马上挤上车去。可就在拥挤时，朱已悄悄挤下车来。车开后，朱换乘马车去贵

阳。马车快到现在艺校的地点时（当时国民党在那里设有检查站），朱突然又下了马车，走小路进城。据说这时挤上汽车的特务们正在检查站等待朱的到来。过了两天，正当特务们在贵阳四处寻觅朱文达时，朱文达早又秘密返回花溪家中。我和朱文达是同班同学，关系较好。朱让他的父亲来约我到他家去，我才知道朱已办完事，又将去贵阳。但当时已经到了这地步：不仅他不能坐车去，而且即使走路去，过花溪大桥一带时，也十分危险。当时朱厚泽同志也在座，共同商定，把朱文达化妆成市民，让我陪同着他，在黄昏时分从老贵大来到清华中学，在我的宿舍过夜，次晨才从我的宿舍翻越棉花关，转移到贵阳，然后去云南。朱文达便这样安全地脱险了。特务们的一再扑空，一方面说明革命者的机智勇敢，另一方面也说明由于群众拥护共产党，自觉支持革命，自觉抵制反动势力，因而使得特务们变成了“瞎子”，处处碰壁，闹出不少笑话。

当然，革命是要付出代价的。廖崇美烈士出走后，不幸被捕，在“双十二”大屠杀中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连毫无组织关系的许多人（如高言善等）也都同时遇害。但是，革命的巨轮是不可逆转的。烈士们的鲜血迎来了曙光，迎来了朝阳。不久，贵州人民盼来了解放。从此，高原上升起了太阳，阳光照亮了山城，照耀着革命志士的血迹，照耀着千万人民的心灵。人们将加倍努力，为了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明天而贡献出自己的一切。

“筑光音乐会”女中队在花溪的活动

陈 胤 孙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民族危机严重万分，全国人民一致要求对日作战，抗日情绪空前高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促进了全民总动员，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地下党领导的“贵州省学生抗日救亡联合会”（简称学联）在各学校活动，宣传形势，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抗日救亡。

一九三八年，国民党顽固派于二月十九日公开逮捕各中学的学生领导，诬蔑他（她）们是“托派”、“汉奸”。在党的领导下，“学联”组织数百人结队上街游行，请愿，高呼口号，要求释放无辜被捕的同学，要求团结起来一致抗日，高唱“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枪口对外，齐步前进，不打老百姓，不打自己人……”等抗日歌曲。抗日救亡的爱国行动，震动了贵阳山城。国民党顽固派先是回避接见学生，事后就下毒手，逮捕了地下党的黄大陆、李策同志。“学联”遭到破坏后，党动员“学联”绝大部份成员转到“筑光音乐会”，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以后“筑光”以“募寒衣”名义开始了演出。在“中苏文化协会贵阳分会”成立时，按地下党的安排，“筑光”在伪省党部礼堂高唱《国际歌》。以后又进行演出、义卖、募捐和写慰问信，慰劳前方战士。